

從鼎革際遇重探 清初遣戍東北文士的出處認同

王學玲

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提 要

清初流放東北荒塞的文士數量遠超乎想像，學者向來關注不多，偶見論述，也僅及其流放生涯。事實上，這些遣戍文士幾乎跨越明、清二朝，歷經天崩地解的家國劇變，山谷陵替的鼎革創傷同樣為其生命的重要景觀。其於甲申年的周旋進退，不僅突顯個人在亂局中的艱難處境，亦可窺見當時更複雜而龐大的政治、文化認同問題。本文結合鼎革際遇的生存實況，不從統治者立場，轉由文士角度剖析流放成因，闡述其出處抉擇背後，改朝換代的認同思索與複雜曲折的心靈圖像。首先重返歷史現場，以表列方式彙整流放文士之出處選擇，概述其流放戍所、案件，以及之後或返回中原、或亡於戍所的際遇。其次，以幾個或懸而未決，或須深入釐清的特殊人物案例，說明鼎革之際流放文士出處抉擇複雜現象。最後，藉由梳理遣戍之因，回顧近、當代學者對於東北流放文士的論述形成。其中「流放論述」與民族意識的緊密關聯，如何看待明清之際士人的出處作為，及對明遺民、降清者的評價定位，皆為本文關懷所在。

關鍵詞：甲申 流放 清初 東北 認同

從鼎革際遇重探 清初遣戍東北文士的出處認同

王學玲

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緣 起

明清之際是個風起潮湧的萬變時代，每個生命都被迫面對具體存在的現實艱難。對知識份子而言，最無可規避的自是國破家亡後的何去何從，亦即出處進退的自我抉擇，其中所透露個人如何思索存在價值，及其難以言喻的複雜心靈圖像，向為筆者關注。^❶隨著認同意識的追索考察，與相關文獻資料的蒐集、閱讀，筆者注意到順治 14 年（1657），受「南園科場案」牽連，同被流徙寧古塔的方拱乾（1596-1666）、吳兆騫（1631-1684）。透過二人與親友的往返詩文，吳兆騫流徙塞外的傳記爬梳，函可（1612-1660）、陳之遴（1605-1666）、方孝標（1618-？）、張縉彥（1599-1670）、祁班孫（1635-1673）、郝浴（1623-1683）……。愈來愈多流放文士及其書寫引起筆者關注。原來清初遣戍東北荒塞的士人數量遠超乎想像，其間所蘊藏豐富的文學、文化意涵，筆者曾就其域外游紀，考察文士如何以主動且積極的書寫行動，安頓流放自我的存在意義，並因此勾勒出清初寧古塔罕為人知的地景風貌，使其成為傳世不朽的

❶ 氏著：《明清之際辭賦書寫中的身分認同》（臺北：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 1 月）。

文本資產。^②

事實上，以區域為主的東北研究並非乏人問津，滿清之後的東北現代文學、「滿洲國」的歷史文化、文學研究大抵都不寂寞。倒是東北古典文學，學界偶見論述，卻著墨不深。^③特別是筆者所考察的流放文士，幾乎集中探討其遣戍後的邊地處境，忽略他們同樣歷經家國驟變的明亡清興時期，形成過度簡化生命史的斷裂理解。清初遣戍東北文士，大都被視為「清代民族高壓政策最直接的受害者。」^④也就是透過科場案、通海案、奏銷案、抗糧案、逃人法等政治事件，統治者藉以鎮壓漢族縉紳士人等反清勢力，遂有大量流人遣戍東北。^⑤在政權尚未鞏固之際，清廷排除異己，箝制漢人思想的種種作為並不奇特。但在此大論述之下，極易造成流放文士似為不認同新朝的先入印象，混淆了明亡之際不同主體的各自主張。尤其細讀現有的文獻傳記，除少數持續參與抗清行動，大多數文士在流放前或已任清職，或投入科場。不合作，缺乏認同之說仍待釐清。最好延伸至甲申鼎革，爬梳流放文士的曲折處境，方得轉從遣戍者的角度理解其出處抉擇，從而省思其流放背後複雜的認同意識及其歷史現象。

基於此，本文所指「清初」乃一動態時間概念，端視歷經明亡之流放文士生命週期。如方拱乾生於明神宗萬曆 24 年（1596），卒於清聖祖康熙 5 年（1666）、吳兆騫

② 氏著：〈是地即戍土：清初流放東北文士的「絕域」紀游〉，《漢學研究》第 24 卷第 2 期，2006 年 12 月。氏者：〈一個流放地的考察——論清初東北寧古塔的史地建構〉，《文與哲》，第 11 期，中山大學中文系，2007 年 12 月。

③ 40 年代，謝國楨《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後改名為《清初東北流人考》，收入《明末清初的學風》）乃研究明清之際流放東北文士的開山之作。大陸學者李興盛以近 20 年時間陸續撰寫《東北流人史》、《中國流人史》，主編《詩人吳兆騫系列》、《流寓文化中黑龍江山水名勝與軼聞遺事》，意圖創建一種新的史學流派，重視流放文士的特殊性及其歷史研究的學術價值、現實意義。其他如張玉興廣搜選集、方志、筆記，編注《清代東北流人詩選注》、馬清福《東北文學史》以遣徙區域為界，分述清初瀋陽、鐵嶺、尚陽堡、寧古塔等流放文士的詩歌風貌、散文雜著。加上彭放等主編《黑龍江文學通史》，從社會歷史、文化現象，逐漸進入文學視域，應是目前明清之際流放東北文士的研究趨向。

④ 何宗美：「從本質上講，東北流人是滿清專制政治的特有產物，是清代民族高壓政策最直接的受害者。」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2003 年），頁 353。

⑤ 同上註，頁 354。

生於明毅宗崇禎 4 年（1631），卒於清聖祖康熙 23 年（1684），皆為論述範圍，並沒有固定的時代斷限。這些文士大都特指從關內各地流徙東北，尤以漢人族群居多，學者多稱之「流人」。如謝國楨，清廷「把無辜的江南和河北的人民，硬是加上罪名，流徙到東北去拓荒，繼之山東逃難的老百姓，和流亡的商人都跑到關外來。」^⑥廣義而論，東北流人之「人」涵括自願、非自願，因各種因素遷入東北的「人民」，有士人，也有百姓。狹義來看，為了精準區分流放士人與流亡百姓的不同，多將前者稱為「流人」，後者視作「流民」。比方陶德陽《流民史》、池子華《流民史話》、羅彤《漢代的流民問題》^⑦都在討論百姓流亡、遷移等問題。而從謝國楨專章考證「僧函可謫戍瀋陽」、「順治丁酉科場獄案與吳兆騫、孫暘等之流徙」、「浙中通海案遣戍諸人」、「龍眠方氏舉家遷徙及《南山獄案》」等，其所指「流人」當為「清初士大夫，流徙遼左」。^⑧李興盛研究東北流人史，清代部分專論遣戍制度下被流徙的文人墨客。^⑨張玉興選注清代東北流人詩，挑出「清朝前期被流放到東北的文人學者」。本文所謂流放文士，同於狹義「流人」，亦即現存文字記錄之文人士子，東北境內諸省之間互相遣戍，東北境內向關內各地遣戍者暫且不論。

清初流放戍所主要涵括瀋陽盛京、尚陽堡（今遼寧開原縣東 40 里）、鐵嶺（今遼寧省鐵嶺）、直至寧古塔（今黑龍江寧安縣）等地，本文所指「東北」，主要以此幾處流放地為是，相關之歷史地理，各自收留那些遣戍文士，及其衍生之出處問題，於第二節重返歷史現場，輔以表列敘述之。第三節進一步以幾個或懸而未決，或須深入釐清的特殊人物案例，說明鼎革之際流放文士出處進退的複雜現象。最後，藉由梳理遣戍之因，回顧近、當代學者對於東北流放文士的論述建構，其中如何看待明清之際士人的自我認同，及對明遺民、降清者的種種評價，尤值深思。

近年來，筆者對於明清之際的關懷視角逐漸越過江南水域，來到文士遠戍的東北

⑥ 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上海書店，2004 年），頁 98。

⑦ 陶德陽：《流民史》（上海：上海文藝，1997 年）。池子華：《流民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0 年）。羅彤：《漢代的流民問題》（臺北：臺灣學生，1989 年）。

⑧ 《明末清初的學風》，同註⑥，頁 7。

⑨ 李興盛：《東北流人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1990 年）。

地區，本文當可視為系列研究之一。其中最困難，在於流放東北的文士數量雖多，現存的著作卻十分有限，即便可見，也分散臺灣、大陸、日本等圖書館。筆者近年往返各地查閱，或抄錄，或翻拍，雖有所獲，但礙於時間和各圖書館之規定限制，仍待努力。透過這些得之不易的文獻，本文觀察時間從流放生涯往前延伸，考察文士於鼎革之際的處境景況，希望較全面抉發其個別或群體的存在圖景。除可補足現階段對於流放文士理解之不足，尚能伸入滿族龍興之地的東北，探析明亡之前華北、遼東地區詭譎的政局演變。此外，明清之際文士的出處向來備受爭議，〈貳臣傳〉之編纂更將此認同議題推向關注焦點，文士的流放是否出自抵制新朝與之前身分抉擇的關聯，何嘗不是時代縮影，恰可提供我們重新檢視明清之際多變曲折的生命圖像。

二、重返歷史現場——流放者的鼎革抉擇

對於清初文士，特別是惦念故明的文士，1644年甲申3月19日無疑是歷史創傷的一刻。^⑩就在這天前的3月18日午夜後不久，李自成軍隊擊破廣寧門（今廣安門）直涌北京，翌日攻入紫禁城，崇禎朱由檢在內廷北道的煤山投繯自盡。鼎革喪鍾敲起，揭開清初長達數十年的時局混亂，也註定士人流離失所之易代遭遇。但考驗並不如此輕鬆，不到2個月，清軍便以擊潰大順政權，為明人報君仇的姿態入主中原。南明君臣如何應對接踵而來的變局是後話。光在紀年上，甲申1644既是明朝崇禎17年，也是大清順治元年，又為大順永昌元年，三方互相角力的敵對政權，加上福王被擁戴登基，其所拋出的時代難題之一是何措手足的進退抉擇。積極抵抗、消極走避，還是進入效命，亦或轉向另一方，身處明清之際的流放東北文士自是無法迴避。只是抵抗誰，走避誰，又效力誰，都須仰仗史料。清初流放東北文士數量雖多，其著作書寫大多散佚，倒是前述《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中國流人史》、《東北流人史》、《清代

^⑩ 1644年3月19日為中國農曆，換算西曆乃4月25日。西方學者論述此段歷史多採西曆，如魏斐德著、陳蘇鎮、薄小瑩譯：《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1998年）。司徒琳：《南明史》（上海：上海書店，2007年）。

東北流人詩選注》、《東北文學史》、《黑龍江文學通史》等現代論著累積不少研究成果，先據之彙整流放文士之出處選擇，同時註明流放戍所、案件，以及之後或生或死於塞外之概況：

姓 名	生 卒 年	戍 所	大順	任清官職	抗清	流放案件	返	亡
方拱乾 安徽桐城	1596-1666 萬曆 24-康熙 5 授編修，遷中允，授東宮講官	寧古塔	被俘	▲		順治 14 年 南闡科場案	▲	
李 裊 山東高密	1597-1656 萬曆 25-順治 13	尚陽堡		▲		順治 12 年 逃人法		▲
左懋泰 山東萊陽	1597-1656 萬曆 25-順治 13 明吏部郎中	鐵 嶺	▲ 歸降	△	△	順治 6 年 仇家所訐		▲
張縉彥 河南新鄉	1599-1670 萬曆 17-康熙 9 歷兵科都給事中、兵部尚書		被俘 歸降 △	▲		順治 17 年 漢臣黨爭，刊刻《無聲戲》		
吳 達 江蘇無錫	1604-1666 萬曆 32-康熙 5	鐵 嶺		▲		順治 13 年 胞弟、堂叔潛通逆賊		
陸慶曾 松江華亭	約 1605-？ 萬曆 33-？	尚陽堡				順治 14 年 北闡科場案		▲
陳之遴 浙江海寧	1605-1666 萬曆 33-康熙 5 明任翰林院編修、中允等	盛 京		▲		順治 15 年 漢臣黨爭		▲
釋函可 廣東博羅	1612-1660 萬曆 40-順治 17	盛 京			△	順治 4 年 文字獄		▲
李呈祥 山東沾化	1617-1688 萬曆 45-康熙 27 明選庶吉士	盛 京		▲		順治 10 年 上〈辨明滿漢書〉	▲	
方孝標 安徽桐城	1617-1697 萬曆 45-康熙 18	寧古塔		▲		順治 14 年 南闡科場案	▲	
方亨咸 安徽桐城	1620-1681 萬曆 48-康熙 20	寧古塔		▲		順治 14 年 南闡科場案	▲	
張 賁 浙江錢塘	1622-？ 天啟 2-？	寧古塔				順治 14 年 科場案	▲	

丁 澎 浙江杭州	1622-約 1686 天啟 2-約康熙 25	尚陽堡		▲		順治 14 年 河南闖場案	▲	
楊 越 浙江山陰	1622-1691 天啟 2-康熙 30	寧古塔			▲	順治 16 年 通海案		▲
郝 浴 直隸定州	1623-1683 天啟 2-康熙 22	盛 京		▲		順治 11 年 彈劾吳三桂	▲	
劉嗣美 河南陳留	1623-1686 天啟 2-康熙 25	尚陽堡				順治 14 年 坐贓自罪		
孫 暘 江蘇常熟	1626-1701 天啟 6-康熙 40	尚陽堡				順治 14 年 北闖科場案	▲	
季開生 江蘇泰興	1627-1659 天啟 7-順治 16	尚陽堡		▲		順治 12 年 逃人法		▲
吳兆騫 蘇州吳江	1631-1684 崇禎 4-康熙 23	寧古塔				順治 14 年 南闖科場案	▲	
陳掖臣 江蘇溧陽	1634- ? 崇禎 7- ?	盛 京		▲		順治 11 年 父陳名夏株連		
祁班孫 浙江山陰	1635- ? 崇禎 8- ?	寧古塔			▲	順治 16 年 通海案		▲
魏 瑄 山東壽光	不詳。 明官至御史	盛 京			▲	順治 11 年 逃人法		
左暉生 山東萊陽	不詳 左懋泰之子	鐵 嶺		△	△	順治 6 年 為仇家所訐		
左昕生 山東萊陽	不詳 左懋泰之子	鐵 嶺		△	△	順治 6 年 為仇家所訐		
張天植 浙江秀水	不詳	鐵 嶺		▲		順治 14 年 北闖科場案		
戴國士 江西新昌	不詳 天啟 7 年進士	鐵 嶺		▲		順治 5 年 被劾「偽作風狂， 中懷叵測」		
諸 豫 江蘇無錫	不詳	鐵 嶺 尚陽堡		▲		順治 14 年 北闖科場案	▲	
孫 樞 河北寧晉	不詳	鐵 嶺				順治 14 年 北闖科場案		▲
董國祥 直隸安平	不詳 崇禎 13 年進士	尚陽堡		▲		順治 17 年 為貪官盧慎言寄收 金銀		
張 恂 陝西涇陽	不詳 崇禎 16 年進士	尚陽堡		▲		順治 14 年 北闖科場案	▲	
蔡 础	不詳	尚陽堡				順治 18 年	▲	

浙江黃岩	明諸生					抗糧案		
張人綱	不詳	尚陽堡				順治 18 年		▲
浙江臨海	明諸生					抗糧案		
何志清	不詳	尚陽堡				順治 18 年		
浙江臨海	明諸生					抗糧案		
陳大捷	不詳	尚陽堡				順治 18 年	▲	
浙江臨海	明諸生					抗糧案		
潘震雷	不詳	尚陽堡				順治 18 年	▲	
浙江臨海	明諸生					抗糧案		
錢 威	不詳	寧古塔			▲	順治 14 年		▲
蘇州吳江						南闡科場案		
李兼汝	不詳	寧古塔				順治 16 年		▲
浙江蕭山						通海案		

以上以「▲」符號標識者乃表列之甲申出處，與流放後或返回中原、或亡於戍所的平生大抵較確定。如郝浴，定州人，順治 6 年（1649）進士，官刑部主事，翌年改授湖廣道御史，巡按四川，因忤吳三桂，遣戍盛京，至康熙 14 年（1675）始免罪取回錄用，復原官，計流放塞外凡 22 年。^⑪又如楊越（1622-1691）順治 16 年（1659）以浙東通海案，與妻子范氏同被流放塞外。^⑫無符號標明表示其時活動並不明確，如抗糧案蔡础、張人綱、何志清、陳大捷、潘震雷等人，明亡時對於大順與清人的態度不明。以「△」標識，主要有左懋泰、張縉彥、釋函可，據筆者所見，相關之文獻筆記對三人於甲申之際的出處記載有所出入，值得進一步深究，遂為本文下一節之論述案例。連帶地，左懋泰之子左暉生與左昕生的作為亦待考察。

檢討表列諸多現象前，有必要對清初東北管理及其流放戍所稍作說明。清人入主

⑪ 《清史稿》，卷 270〈郝浴傳〉：「郝浴，字雪海，直隸定州人。（順治）十一年，……三桂乃撫浴保寧奏捷疏有『親冒矢石』語，指為冒功，論劾，部議當坐死，上命寬之，流徙奉天。……浴至戍所，益潛心義理之學，嗜《孟子》及《二程遺書》，以『格知格物』顏其廬，刻苦厲志。……（康熙）十四年……上乃召浴還，復授湖廣道御史。」趙爾巽等撰：《清史稿》（臺北：新文豐，1981 年），頁 1083。

⑫ 《清史稿》，卷 499〈楊越傳〉：「楊越，初名春華，字友聲，浙江山陰人。……康熙初，越友有與張煌言交通者，事發，辭連越，減死，流寧古塔。……越卒於戍所，例不得歸葬，賓、賁請不已，又二年乃得請。」《清史稿》，同上註，頁 1551-1552。

中原後不僅保留了入關前的首都瀋陽盛京為陪都，並針對各地區、民族，分別推行八旗制度，州縣制度，盟旗制度、噶珊制等四種不同管理方式。¹³除了統管當地土著，自十七世紀中葉起，陸續從關內進入的流民、流放文士形成特殊的居民組合景觀。前者大多來自鄰近東北的直隸、山東、河南、山西等地，由於易代戰亂，離鄉背井流入土地廣闊、人口稀少的塞外謀求生計。後者專指遭刑罰，強制發配東北邊疆的各類罪犯。順治初，主要為瀋陽、尚陽堡、鐵嶺等地，順治中葉，流放地點向北擴展，來到吉林烏喇、寧古塔，而後更遠戍卜魁（一作卜奎，即今齊齊哈爾市）、黑龍江城、瑗琿，¹⁴顯見清代東北流放區域相當廣。尤其在各大城鎮據點駐防八旗重兵，以柳條邊扼守關隘要路，乃清王朝統治東北的重要管理網絡，形成極為特殊的空間景觀，遼寧瀋陽與黑龍江寧古塔皆於其內。

柳條邊，或「折柳之樊」、「插籬為邊」、「插柳為界」、「遍植以柳」、「結繩列柵」、「編木為柵」，¹⁵大體上是利用東北隨處可見，插條存活的柳樹，「今遼東皆插柳條為邊，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籬，而掘壕於其外，人呼之為柳條邊，又曰條子邊。」¹⁶柳條邊、條子邊、柳城、柳邊、邊牆等皆為其稱，大約是在寬3尺、高3尺的土堤上，「大約每隔5尺插柳3株，柳條之間用繩繫結橫枝相

¹³ 八旗制度施行於旗人地區，凌駕其他管理制度之上，居於主導地位。州縣制度施行於漢族地區，並逐漸向滿、蒙等族地區擴展。盟旗制度施行於蒙古族地區，以八旗制度為基礎，保留了蒙古族固有的社會結構。噶珊制度施行於黑龍江下游及烏蘇里江以東各少數民族地區，建立在原有的姓、鄉等氏族、部落、村屯基礎。詳閱佟冬主編：《中國東北史》，（長春：吉林文史，1998年）第4卷，頁1281。

¹⁴ 《清史稿》，卷143〈刑法二〉：「初第發尚陽堡、甯古塔，或烏喇地方安插，後并發齊齊哈爾、黑龍江、三姓、喀爾喀、科布多，或各省駐防為奴。」《清史稿》，同註¹¹，頁524。

¹⁵ 如《鐵嶺縣志·建置志》：「東西二百十七丈九尺……折柳之樊，未嘗無也。」賈弘文修、董國祥纂，《鐵嶺縣志》，卷上，頁1。金毓黻主編：《遼海叢書·2》（瀋陽：遼陽書社，1985年），頁765。《義縣志》：「明創制，清因之。例于邊牆內外遍植以柳，任其事者僅掘牆基置土內外，逢山或掘土或壘石，如一牆而已。」趙興德修、王鶴齡纂：《義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東北·遼寧·16》（臺北：成文，1973年）。

¹⁶ 楊賓：《柳邊紀略》，卷1，頁1a。《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上海：上海古籍，1995年-），冊731，頁255。

聯。」¹⁷：



柳條邊圖¹⁸

從修築之時間、範圍區分，柳條邊又可分名為「老邊」的遼河流域和稱之「新邊」的吉林部分。老邊又名盛京邊牆，修築或始於皇太極時期，最晚應不超過順治年間。

¹⁷ 佟冬主編：《中國東北史》，同註¹⁵，頁1390。

¹⁸ 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北京：文物，1997年），圖135。

「大體上沿襲了明代遼東邊牆的走向和範圍」¹⁹，「分東西兩段，東段自鳳凰城以南至海起，至開原東北的威遠堡；西段自威遠堡至山海關，全長 1950 餘里。」²⁰老邊以內為盛京將軍轄境，邊外為吉林將軍管轄，康熙 9 年（1670）到康熙 20 年（1681），清廷又修築「西南自開原威遠堡，東北到吉林北法特亮子山上的邊牆，全長 690 里，俗稱『新邊』」。²¹總體稱之，盛京邊牆之內稱「邊內」，以外稱「邊外」。「邊外」對「新邊」而言，又是「邊裡」。柳條邊條築目的，是為保護龍興之地，乃「盛京與寧古塔，以及盛京、寧古塔與蒙古東三盟之間行政區域的分界線；是清統治者推行民族隔離政策，禁止各族越界而居，以及保護滿族統治者對邊外土地與山林資源獨占權益的一道隔離線。」²²如柳邊條裡盛產人參、貂皮、鹿茸、東珠等珍貴物產，劃為禁區不許漢人開發和獵取，而為清廷獨占。姑不論柳條邊果真達到清王朝維護族群經濟、政治、族群利益之目的，保護龍興之地，以滿族為主體的意識不容置喙。至於「柳邊條」的構築，更是清人有意識保護龍興之地，與其他族群的隔離封線、目的在於防止滿族漢化，獨占東北特產。多為漢族的遣戍文士，意外闖入異域，其關於自我與滿族等書寫，透顯對流放空間的考察感知，成為後來志書的基型。²³

至於上表所列文士多流放盛京、鐵嶺、尚陽堡、寧古塔等戍所。明代東北地區女真族分為生女真與熟女真，熟女真又有建州女真、野人女真之別。明萬曆 44 年（1616），建州女真首領之後努爾哈赤，經過數十年的征戰，先後收服散亂的女真各部，建立以女真族為主體的統一政權，定都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滿族自治縣永陵鎮），國號為金，正式與明王朝徹底分裂、對抗。隨著遼東戰況愈來愈激烈，努爾哈赤先在天命 6 年（1621）將首都遷至遼陽，8 月又在太子河東岸（今遼寧新城）營建新都東京。天命 7 年（1622）3 月遷都東京。天命 10 年（1625），經過長期遷移，後金終於選定瀋

¹⁹ 王錦厚：〈清彩繪柳邊圖考略論〉，《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同上註，頁 161。

²⁰ 李治亭主編：《東北通史》（鄭州：中州，2003 年），頁 490。

²¹ 《東北通史》，同上註，頁 490。

²² 佟冬主編：《中國東北史》，同註¹⁵，頁 1389。

²³ 陌生而荒遠的域外地景，如何被勾勒出清楚圖像，成為流放文士筆下的文本資產，詳見氏者：〈一個流放地的考察——論清初東北寧古塔的史地建構〉，同註²。

陽為都城。據《鐵嶺縣志》記載，「明洪武二十一年置鐵嶺衛在今縣治東南五百里，地接高麗界，後二十六年徙此，仍名鐵嶺衛，領中左右三千戶所」。²⁴原來鐵嶺是明朝軍事組織的名稱，鐵嶺衛初設之處與稱鐵嶺之地並不相同，所謂「鐵嶺」乃指古銀州一帶。²⁵然鐵嶺地處極邊，周圍世居葉赫女真，鄰近之開原位於遼河中游左岸，東西北三面與女真、兀良哈蒙古相毗鄰，二地同具有斷阻建州女真與蒙古聯繫，阻止建州吞併葉赫的戰略地位，為明代東北重要的軍地要塞。萬曆 47 年（1619）努爾哈赤親率大軍，攻陷並焚毀開原城後，便直逼鐵嶺城，明軍幾經力抗依然棄守，揭開此後遼東失利的序幕。

尚陽堡，又名靖安堡，《盛京通志》：「尚陽堡，城東四十里……舊名靖安堡。」²⁶由於地近開原、鐵嶺，亦為明代重要的軍事要地。前言努爾哈赤親率大軍進攻開原之前，就先打入靖安堡，故與開原、鐵嶺相同，均在遼東戰役歸後金所有。「寧古塔」古有新舊二城，舊城，在「城西北五十里，海蘭海（今海浪河）南，石城高一丈餘。」²⁷約莫今黑龍江海林舊街。康熙 5 年（1666）遷建新城，即今寧安縣，自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一直為軍地重鎮。清入關後，本為八旗駐防城市，順治 3 年（1646），設奉天昂邦章京管轄東北地區，寧古塔為其所屬。後來沙俄不斷入擾，為加強北部邊防，順治 9 年（1652），「命梅勒章京沙爾虎達、甲喇章京海塔、尼噶禮統官兵駐防寧古塔。」²⁸順治 10 年（1653）又命沙爾虎達「為昂邦章京，鎮守寧古塔地方。」²⁹康熙元年（1662）改為寧古塔將軍，管轄區域廣袤千里，涵括松花江流域、烏蘇里

²⁴ 賈弘文修、李廷榮補輯：《鐵嶺縣志》，卷上，頁 1。金毓黻主編：《遼海叢書·2》，同註¹⁵，頁 787。

²⁵ 《鐵嶺縣志》：「鐵嶺，古銀州地。」同上註，卷上，頁 1。郝浴〈復陽先生自記〉：「鐵嶺，古銀州也。」《中山全集》四種 15 卷，臺灣傅斯年圖書館藏，據康熙間旋吉堂本翻印，清康熙間（1662-1722）刊本。

²⁶ 阿桂等纂修：《欽定盛京通志》，卷 29〈城池一〉，頁 34。《欽定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1987 年），冊 501，頁 584。

²⁷ 《欽定盛京通志》，同上註，卷 31，頁 641。

²⁸ 《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臺北：新文豐，1978 年），順治 9 年 7 月丁亥，卷 66，頁 773。

²⁹ 《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順治 10 年 5 月甲戌，卷 75，同上註，頁 886。

江以東，寧古塔成為東北地區首要的政治、軍事中心。直到康熙 15 年（1676），寧古塔將軍移治吉林烏拉，以原吉林副都統移駐寧古塔，其舉足輕重的地位才逐漸喪失。

盛京、鐵嶺、尚陽堡、寧古塔都是清初東北重要的軍事要地，關為戍所，一來就近監督管理。二則遼東地區經過明末四十餘年的爭戰蹂躪，幾近殘破，清廷建立之初積極進行重建，流放文士至此可擔負墾荒實邊之事。這些文士何宗美以為「大多數來自江南和山東等地即最不甘屈服清人統治的地區」。³⁰丁海斌、時義研究清代陪都盛京流人文化也提出「這些以千以萬計的流人把中原和江南的文化帶到這裡，開展各種文化活動」。³¹而由本文初步整理所見，除江南、山東外，河南、河北、陝西、江西都有文士被謫戍。盛京地區，浙江 1 人、廣東 1 人、山東 2 人、直隸 1 人、江蘇 1 人，鐵嶺山東 3 人、江蘇 1 人、浙江 1 人、江西 1 人、河北 1 人，倒是流放尚陽堡，因為抗糧案，的確以浙江人士為主。僅就現存作品傳世的文士考察難免有以偏概全之虞，但依張縉彥、方拱乾實地觀察，「（流）徙來者，多吳、越、閩、廣、齊、楚、梁、秦、燕、趙之人」、³²「該地『華人』則十三省，無省無人。」³³可見遣戍寧古塔者的流人來自四方，江南人是其中部分。目前大都認為造成文士流放的重要政治案件有順治 14 年（1657）丁酉科場案（主要為順天北闈、江南南闈）、順治 16 年（1659）通海案、順治 18 年（1661）抗糧案、奏銷案、哭廟案，³⁴其中南闈科場案與通海案多被流徙寧古塔，張縉彥、方拱乾所見卻不以江南人居多，極可能流放寧古塔之因尚有其他。至於北闈科場案、抗糧案、奏銷案、哭廟案，根據記載，大都流徙尚陽堡。鐵嶺與盛京的文士涉案則較為複雜，朋黨、逃人、被彈劾、進諫等，也就是說以整個遼寧瀋陽區域而言，罹罪流放的應該不只江南人。³⁵突顯，或者說看重江南文士流放東

³⁰ 《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同註④，頁 354。

³¹ 丁海斌、時義：《清朝陪都盛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7 年），頁 209。

³² 張縉彥：《域外集·六博圍棋說》（哈爾濱：黑龍江教育，1984 年），頁 7。

³³ 方拱乾撰，李興盛、張杰點校：《絕域紀略》（哈爾濱：黑龍江人民，1985 年），頁 1177。

³⁴ 《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同註④，頁 354-361。

³⁵ 也有部分研究著作，提出流放東北文士「廣泛來自幾乎全國各地」。如《中國東北史》，同註⑬，頁 1687。

北的現象背後實乃隱涵某種歷史觀看視角，亦即將流放文士、江南、不甘屈服清人統治三者等而視之，表彰家國驟變之際應有的出處作為，以為後人表率。因而牽動了甲申鼎革，明亡之士的進退認同及其歷史評價與定位，下節即以幾個清初流放東北的文士個案為例，進一步析論之。

三、幾個人物案例——函可、左鬱泰、張縉彥

作為南明政權的主要腹地，江南多抗清事件本為史實，清廷因此對江南文士採取猜忌、打壓也可想而知，江南不甘於屈服清人統治的說法應該不差。然而就算流放文士大都來自江南，除通海案祁班孫、楊越、李兼汝，就前小節表列資料，大部分文士謫戍前已任清職。至如吳兆騫、孫暘等人參加南、北闈考試，間接也認同了主其事的清廷。換言之，轉從文士的角度再探，其認同問題就顯得複雜且棘手，本節則從幾個特殊事例觀察。首先，是順治 4 年因文字獄案流放瀋陽盛京的釋函可。依汪宗衍《明末剩人和尚年譜》，其俗名韓宗騷，字祖心，號剩人，俗名韓宗騷，明禮部尚書韓日纘之長子。崇禎 12 年（1639）落髮為僧，是年 29 歲。³⁶甲申年函可於廣州城東黃華塘創建「不是庵」為靜修之所，「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北京，和尚聞變悲慟形詞色，旋聞弘光帝立於南京，十二月，以請藏經附官人舟北上。」³⁷來到金陵，住在友人顧夢（1599-1660）游家。「五月，清兵渡江，弘光帝被害，和尚親見諸死事臣，某遇難，某自裁，紀為《再變記》一書，復黯然形諸歌詠，時人多危之，和尚為之自若。」³⁸直到順治 4 年（1647）夏，函可利用其父曾是清招撫大學士洪承疇會試房師的舊關係，

³⁶ 汪宗衍：《明末剩人和尚年譜》：「道獨舉勘破婆子話，和尚更豁然諸古人長處，獨曰：子今不疑也，即隨入匡山，過曹溪，六月十八日，禮六祖下髮於舟中。」《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20 輯》（臺北：臺灣商務，1986 年），頁 10。

³⁷ 《明末剩人和尚年譜》，同上註，頁 13。函昱，〈千山剩人可和尚塔銘〉：「甲申之變，悲慟形辭色，傳江南復立新主，頃以請藏附官人舟入金陵。」《千山詩集》，〈卷首〉，頁 7。《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1398》（上海：上海古籍，1995 年-），頁 5。

³⁸ 《明末剩人和尚年譜》，同上註，頁 14。

取得印牌，準備南歸。「行李過城門，守者檢篋笥有〈弘光帝答阮大鍼書稿〉，及《再變記》，乃擒送軍前。」³⁹幾經酷刑拷掠押解進京，下刑獄部。順治 5 年（1648）4 月函可及其門徒 5 人，遣戍瀋陽。

凡述及函可，無不讚揚其反清的民族氣節，詩歌「充滿了謳歌民族鬥爭，眷懷故國的情調。」⁴⁰、「在長達十二年的流放生涯中，他以無限眷戀之情懷念著舊明政權、故鄉親友，滿懷對清初殘暴統治的不滿。」⁴¹函可撰私史下獄遣戍是事實，但為什麼要入南京請藏經呢？是單純的宗教活動，還是另有意圖的政治作為。何宗美的整理：

其一，函昱〈千山剩人可和尚塔銘〉曰：「甲申之變，悲慟形辭色，傳江南復立新主，頃以請藏附官人舟入金陵。其二，《清史稿》卷二四二〈洪承疇傳〉曰：「承疇疏言，函可乃故明尚書韓日瓚之子，出家多年。乙酉春自廣東來江寧，印刷藏經。」其三，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卷四曰：「甲申之變，悲慟形辭色。聞福王立，乙酉以請藏經金陵，居江寧顧夢游樓上。」⁴²

三者中，洪承疇為免受牽連，疏言有所遮掩，《勝朝粵東遺民錄》是採摘他人資料撰成，相較之下，何宗美認為函昱的說法最可信，也就是函可乃以宗教活動掩護，實質上是為了從事政治活動到南京，極可能如陳寅恪推測，函可到南京，與反清復明勢力皆欲爭取洪承疇有關。⁴³如此一來，又牽涉洪承疇在明清易代之際的作為，也就是其降清與仕清後的諸多行徑。洪承疇之降，清代以來感興趣者極多，野史傳說尤為樂道紛紜，「沈緬女（男）色說、激于義憤說、無可奈何說、還有官方塑造的太宗感化說、愛惜身家說。」⁴⁴身為貳臣的出處忠誠亦為孟森、李光濤、王宏志、王成勉等人之研

³⁹ 《明末剩人和尚年譜》，同上註，頁 15。

⁴⁰ 李興盛：《中國流人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1996 年），頁 672。

⁴¹ 《中國東北史》，同註¹³，頁 1699。

⁴² 《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同註⁴，頁 373。

⁴³ 《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同註⁴，頁 373-374。

⁴⁴ 楊海英：《洪承疇與明清易代之際》（北京：商務，2006 年），頁 66。

究議題。⁴⁵連帶入清後，洪承疇和南明隆武政權、永曆政權、江南秘密復明運動等關係，始終是學者持續關懷重點。易言之，函可到南京果真與地下活動有關，使得清朝當局合理懷疑，也許江南文人與南方抵抗分子之間正在形成一個新的聯盟，就得更證實洪承疇始終與廣州抗清分子有聯繫，且有復明掙扎。正因為文獻資料與目前相關研究仍有待深化，對洪承疇形象才會出現那麼多詮解雜音。謹慎如洪承疇為什麼干冒風險給函可印牌出城，顧念舊情？抑或另有他因？函可究竟因何而來，為何而歸，目前都須要更詳盡的論述。

函可在盛京所組「冰天詩社」及其成員的特性，何宗美界義為「遺老流民」⁴⁶，其社詩不能與一般文人酬唱之作等量齊觀，「反映了在家國淪喪之際流竄邊荒的『遺老流民』的情感世界」。⁴⁷從《千山詩集》的內容看來，函可所流露的遺老悲感實無可疑，但能不能以此論斷「冰天詩社」所有社員身分與其心聲同樣有待商榷。先不論其他成員，光是與函可在詩社同具關鍵地位的左懋泰，在鼎革之際的出處亦是未解。其於北京淪陷時曾歸降大順軍，「任兵政府左侍郎，鎮守山海關等處」⁴⁸，說法不一的是對滿清態度，李興盛認為「清入關後，其行事不詳」⁴⁹，何宗美的評價頗高，以為「左懋泰早年加入復社，在士人中負有盛名。……從兄左懋第為南明使臣以不屈清而殉難，被明遺民目為忠臣義士的楷模。他本人亦能保持『大雪自應持漢節，高松寧肯受秦封』的民族氣節。」⁵⁰弔詭的是，謝國楨之論恰恰相反，「左懋泰為左懋第之弟，懋第北使燕京，不屈死節，懋泰曾投降李自成，後又歸順清朝，懋第不承認是他的兄弟。」⁵¹《萊陽縣志·人物》尤細載一人勸降，一則閉門不納的生動對話，透過

⁴⁵ 相關研究可參《洪承疇與明清易代之際》，同上註，前言頁1-7。

⁴⁶ 《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同註⁴，頁379。

⁴⁷ 《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同註⁴，頁386。

⁴⁸ 王一元：《遼左見聞錄》載，引自李興盛：《中國流人史》，同註⁴⁰，頁673。相同說法亦見《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左懋泰……後歸降李自成」，同註⁴，頁359。《中國東北史》：「原明吏部郎中，大順農民軍兵部左侍郎左懋泰」，同註¹³，頁1700。

⁴⁹ 《中國流人史》，同註⁴⁰，頁673。

⁵⁰ 《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同註⁴，頁382。

⁵¹ 《明末清初的學風》，同註⁶，頁107。

懋第之口，明言懋泰「降敵」作為。⁵²朱溶《忠義錄》呼應亦載投降之說，並說懋第從容受刃後，清廷「默詣懋泰，請收懋第。懋泰懼禍，匿不見。」⁵³

左懋泰入清後的出處究竟顯然眾說紛紜，他自己怎麼說呢？其《徂東集》今已散佚，少數作品見於函可《千山詩集》所收錄「冰天詩社」二次集會之詩，以及《鐵嶺縣志·藝文志》：

神農虞夏忽蕪荒，五十五年事杳茫。絳縣春秋差甲子，楚歌宋玉譜宮商。腐儒不死蠹空在，竄客添齡罪愈彰。松柏好存冬日色，任隨漚沫注滄桑。（〈答諸公見贈〉）⁵⁴

去年已見西方曙，今歲仍親大海瀾。片月人天隨竹杖，慈雲忠孝一蒲團。既窮震旦三千里，又想堯蓂十二看。劫火常留多佛塔，蒼生灰燼共盤桓。⁵⁵

順治7年（1650）「冰天詩社」的首次社集活動，本為左懋泰誕辰而起，函可以此為名，「首倡為詩，和者僧三人，道二人，士十六人。堡中寄和及後至者八人，合二公子，共得詩三十二章。」⁵⁶第2年社集同年冬至後5日，是為函可之壽，此次改由左懋泰主持并首先作詩，眾人迭相唱和，⁵⁷以上即為懋泰二次所留下詩篇。何宗美引《千山詩集》，函可之作〈同社中諸子賦百韻〉，認為「流人結社在文學創作上基本的傾

⁵² 「又使公從兄懋泰說之，泰曾為公母治喪，泰至，公鍵戶不納，但于門內叩頭曰：『以謝爾治喪之德，勿他言，懋第無降敵之兄也。』」《萊陽縣志》卷3，頁22a-22b。《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山東·57》（臺北：成文，1968年），頁1337-1338。

⁵³ 《忠義錄》：「懋第叱曰：『無多道，左蘿石山左男子，必不肯為清宰相。』南面再拜，引頸受刃。……懋第從兄懋泰亦進士，為吏部郎中。降李自成，為兵部侍郎。復降清，為吏部。默詣懋泰，請收懋第。懋泰懼禍，匿不見。」高洪鈞編，《明清遺書五種》（北京：北京圖書館，2006年），頁516。

⁵⁴ 《千山詩集》，卷20，頁9，《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1398》，同註⁵⁷，頁159。

⁵⁵ 《千山詩集》，卷20，頁9，《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1398》，同註⁵⁷，頁159。

⁵⁶ 函可：《千山詩集》，卷20，頁2，《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1398》，同註⁵⁷，頁155。

⁵⁷ 《千山詩集》：「賤辰，承搢 大師率諸公賦師投贈……諸公和者亦如前數。」卷20，頁9。《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1398》，同註⁵⁷，頁159。

向是表達愛國情感和人生悲慨」⁵⁸。此詩陸續出現王子晉、高漸離、屈原、宋玉等人，又有見漢儀，招舊帝等語，不忘故明之心或可見之。⁵⁹從以上二詩讀來左懋泰雖以宋玉自述，但缺乏屈原「忠君愛國」的形象支撐，而是發抒如〈九辯〉不得志的抑鬱悲慨。充滿蕪荒、杳茫，竄戍異域的時間催促之感，並意圖以宗教自我排遣，頻用蒲團、震旦、佛塔等佛家語。至於「慈雲忠孝」一說，由上下詩文讀來，並沒有清楚指向何事，也只是總論地自我闡揚、表露。目前僅有的少數作品，未見左懋泰關於甲申行逕的自我論說，其入清後的出處究竟仍是一樁懸案。

最後，出處進退更為曲折的是列入〈貳臣傳乙〉的張縉彥，其為明崇禎4年（1631）進士，而以兵部尚書表率迎降大順軍。後篡歸鄉里，疾聲收復故土，授得南明復官又向清廷輸誠，最終投向居上風的大清。張縉彥的委蛇善變，列貳臣之屬自非無理，而其多變行徑卻也代表易代之際某一種曲折的心靈圖像。與大學士魏藻德「率百官表賀，素服坐殿前，群賊爭戲侮之，太監王德化叱其誤國」之事，⁶⁰《貳臣傳》外，歷來不假辭色的描寫甚多，如《國權》：「太監王德化從十餘人內出，見兵部尚書張縉彥，詬曰：『爾猶在耶！國家大事，爾與魏閣下二人壞之。』呼從者批其頰，縉彥至垂涕，藻德救之。」⁶¹、《國變錄》：「本晚，百官出，始言太監王德化數十人擁打兵部尚書張縉彥，責其開門迎賊」。⁶²張縉彥又是如何面對往事？從《某居封事》所匯輯的奏疏，即崇禎11年（1638）至14年（1641），張縉彥上疏朝廷，提出對農民起義，

⁵⁸ 《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同註④，頁386

⁵⁹ 詩云：「……吹笙約子晉，擊筑邀漸離。異域留商，石人見漢儀。空城招舊帝，青草惜蛾眉。騷纘屈平賦，怨添宋玉悲。喘酬渾不厭，來往各忘疲。……」此詩或表達了函可不忘故明之心，以屈原剖言其忠。尤其易水江邊，高漸離擊筑為刺秦荊軻送別之形象，似乎隱隱透露抵抗復仇之念。但若據此推論函可南京請經乃具有復明的政治用心，依舊須要更具體的書寫證明。〈同社中諸子賦百韻〉乃遣戍數年後之作，其中函可不僅歷經酷刑流放，應該也已輾轉得知嶺南親人慘遭清軍殺害。就算詩中抵抗復仇的情感不假，不必然實際投身抗清行列，親赴南京。《千山詩集》，卷8，頁4，《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1398》，同註④，頁515。

⁶⁰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臺北：中華，1987年），卷79，頁6622。

⁶¹ 談遷著、張宗祥點校：《國權》（北京：中華，1998年），卷100，頁6055。

⁶² 吳邦策《國變錄》，《秘冊叢說14》，傳斯年圖書館藏鈔本。

清兵作戰的策略建議看來，「二余載，得名奏議百二十焉」⁶³，不能說沒有時局關懷之心。張縉彥現存之作，依筆者所見，崇禎年間刻《某居詩集》，應作於明末之《某居文集》，入清刻《歸懷詩集》，順治 11 年刻有《燕箋詩集》、《徵音詩集》、《懷鄉歸集》、《明湖詩草》。此外，順治 12 年增益新作，將前集重新編次《依水園文集前集》、《依水園文集後集》。《徵音詩集》成於甲申後二年多，⁶⁴關於自己開門迎降與此後事，〈述變歌〉：

天地自定位，日月忽陰晴。造化豈云異，堅脆各自成。嗟我覩凶會，天地忽西傾。赤羽勢已極，苦塊淚尚盈。願言赴國難，辭墓戚子情。旬月瘁臣心，四郊遍鼓鉦。降臣捧檄至，誰使矚孤城（監視杜勛降賊，賊遣至城下，京營某某者縋與偶語）。惟我執愚昧，羞此城下盟。黑風西頭急，餉絕全軍驚。國亡身亦盡，朝房執磴磴。沈業綿未已，亂我死復生（城破，入朝房自縊。窗櫺折，李桂解救）。徒為舉朝哭，無以報聖明。彼相前致辭，款曲如蠅聲。喋血賒求死，慘楚不可名（賊遣牛金星說降，罵拒，賊怒加刑）。遂有梟杰將，待我以悍兵。躊躇龍泉道（守關偽將李謹欲擒，計脫），孤鴻過山鳴。飛飛脫迹去，黃冠一身輕。徒死不塞責，一去嘆冥行。慷慨復嗚咽，君儲陷鯢鯨。潛結義俠士，白霓貫日精（張一方、蔡元吉，一為昆弟，一為姻婭。後戰死，竟尋前約）。繭足二千里，逋臣苦以貞。忽復起彈劍，南指陣雲橫。雨中爭問渡，守卒何猙獰（太原問卜。西嶽廟籤云，雨中問渡，進退維谷。及至南渡，果遇雨，為偽都尉馮國寧詰獲，信有數云）。一手欲補天，運數茫難爭。但留此血性，險難常孤行。⁶⁵

順治 17 年（1660）張御史蕭震復劾張縉彥，言其編刊《無聲戲》二集，自稱「不死英雄」，有「弔死在朝房，為隔壁人救活云云」，冀以假死塗飾其獻城之罪，又以不死

⁶³ 劉理順：〈序〉。張縉彥撰、王興亞點校：《某居封事》（鄭州：中州古籍，1987 年）。

⁶⁴ 卷首題下〈自序〉：「自甲申以來，丙戌以前，流離間關，痛遭賊虐。偶記于襟袖間，迨歸命大清，山高海曠，痛定而思，涓滴未答，聊存歲月焉。」上海圖書館藏順治 11 年刻本，頁 1a。

⁶⁵ 同上註，頁 3b-4b。

神奇其未死之身。⁶⁶蕭震所據，應該就是〈述變歌〉，「城破，入朝房自縊。窗櫺折，李桂解救」等語。依所述，張縉彥實已抱持亡國粹臣的赴難決心，豈知死復生。《無聲戲》二集今已亡佚，「不死英雄」之敘述詳情不得而知。但史籍多錄其開門迎賊，〈述變歌〉遂被視為降臣塗飾捧檄的矯辭，「未聞有身為大臣，擁戴逆賊，盜鬻宗社之英雄；且當日抗賊殉難者有人，闔門俱死者有人，豈以未有隔壁人救活遜英雄」，張縉彥以詭詞惑眾，巧辯欺飾，籍沒家產，流徙寧古塔。⁶⁷尤有甚之，張縉彥化主動為被動，反言「某某者縉與偶語」降檄至，唯其執愚昧，「羞此城下盟」，形成輿論眾說與自我敘述的截然背反。而之後「賊遣牛金星說降，罵拒」等語，同樣在為降清行逕辯說，也就是寧可遭受喋血酷刑，以明報聖恩之心。歷史判其降，已卻從不願言降，莫非張縉彥也深知此舉將背負千古罪名。

牛金星與張縉彥有同鄉之誼，二人皆為河南人，大順軍於「崇禎十三年（1640）進入河南，並實行『不納糧』、『開倉賑貧』、『剿兵安民』等政策後，便得到廣大貧苦群眾的熱烈擁護。」⁶⁸其舉人牛金星，「以六王、風角之說干之。賊大悅，以為謀主。凡事必諮焉，如左右手。……金星於是甘心從賊矣。舉人做賊，自此始。」⁶⁹崇禎 16 年（1643）李自成等人自號大順王朝，即以牛金星為丞相。⁷⁰至於「遂有梟杰將，待我以悍兵。躊躇龍泉道（守關偽將李謹欲擒，計脫），孤鴻過山鳴。飛飛脫迹去，黃冠一身輕。」等語，乃《貳臣傳》所言「篡歸鄉里」事，⁷¹其時間亦非李自成敗走後。原因是大順軍據京後即對官紳施行追贓助餉，並以夾棍刑拷相，「當時在京明廷官僚受到追贓之人數由於史料蕪雜，因此無法作出正確統計，但可以肯定的是，《貳臣傳》裡居多數額之四十四名北籍降清明臣中，至少有八位曾受到大順政權不同

⁶⁶ 《清史列傳》，卷 79〈貳臣傳乙〉，同註⁶⁰，頁 6624。

⁶⁷ 《清史列傳》，卷 79〈貳臣傳乙〉，同註⁶⁰，頁 6624。

⁶⁸ 黃色芬：《華北仕清漢官與明遺民的出處》，頁 22，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97 年。

⁶⁹ 鄭廉：《豫變紀略》，卷 3。樂星輯校：《甲申史籍三種校本》（鄭州：中州古籍，2002 年），頁 116。

⁷⁰ 《豫變紀略》：「賊悅，乃即逆位，號大順，改明年為永昌元年。以牛金星為丞相。」卷 7，同上註，頁 256。

⁷¹ 〈貳臣傳乙〉曰：「四月我朝兵入山海關，李自成敗走，張縉彥篡歸鄉里」，同註⁵⁵，卷 79，頁 6623。

程度之勒索……劉餘祐、孫承澤、張忻、張縉彥等人，為出仕大順之官員，依舊被派助餉，更促其對此政權之離心與不滿。」⁷²在勒索悍兵的逼迫下，張縉彥方以計脫迹，「寡歸鄉里」。

張縉彥另遭非議的是，一方面自我薦請，接受南明弘光授任原官，另一方面又與大清暗通款曲。《貳臣傳乙》：「聞福王朱由崧據江寧，馳疏自言：『集義勇，擒偽官，收復列城。』即授原官，予總督河北、山西、河南軍務印，聽便宜行事。」⁷³《國權》載甲申十月「己未，故兵部尚書張縉彥奏，在河北收義勇，誅偽官，其姻家大學士王鐸保之，仍命兵部尚書，總督北京山西河南軍務，便宜行事。」⁷⁴張縉彥對自己的脫迹不徒死提出了正當說詞，亦即「潛結義俠士」，幫助陷於危殆的南明君儲。然依《豫變紀略》之述：「及福王立，誅從逆臣周鍾、項煜等，沒其家。縉彥徘徊瞿、毫間，不敢入江南界。」⁷⁵並非為了君儲，也不曾毫無猶豫，而是有了駐扎睢州許定國的撐腰，據以恐喝南京，才篤定上疏討官。⁷⁶由此可見，〈述變歌〉幾乎迴避了大部分的擺盪作為，比方奏請投效之前的順治元年九月，「都統葉臣等征山西，師過河北，縉彥詣軍門納款，巡撫羅繡錦趣其赴」。張縉彥即先佯稱足疾，俟疾愈方由長垣入朝。⁷⁷雖然甲申年間，大清還打著為明復仇旗幟，南明盡全力對付的仍為弑君者大順軍。但張縉彥不僅同時周旋在不同政權之間，還不斷闡明「一手欲補手」、「逋臣苦以貞」的自我形象，迴避並正當化諸多作為，招致甚多責難似乎也不足為奇。

《徵音詩集》還有遊歷都、儀封、六安、麻城、商城諸山、龍湖等詩，〈貳臣傳乙〉：「豫親王多鐸統師定河南、江南，縉彥乃遁六安州商麻山中」。⁷⁸從詩作入手，

⁷² 《華北仕清漢官與明遺民的出處》，同註⁶⁸，頁27。

⁷³ 同註⁶⁰，卷79，頁6622。

⁷⁴ 同註⁶¹，卷103，頁6154。

⁷⁵ 同註⁶⁹，卷7，頁281。

⁷⁶ 《豫變紀略》：「縉彥還睢州，依許定國。乃為大言，上疏自謂：『臣義當謁新君，但新撫中原豪傑許定國，李際遇等土兵五十餘萬，躬自簡練，不敢擅離。候旨進發。』以恐喝南京。」同註⁶⁹，卷7，頁281。

⁷⁷ 〈貳臣傳乙〉，同註⁶⁰，卷79，頁6623。

⁷⁸ 同註⁶⁰，卷79，頁6623。

應可細察張縉彥更多不同於史籍，或不為人知的自我觀看之聲。比方《懷歸詩集》收錄返鄉所寫之紀行詩及在京與友人唱酬之作，陳之遴、劉正宗、丁耀亢等皆與之往來。順治 17 年 6 年「左都御史魏裔介劾大學士劉正宗罪惡，言縉彥與為莫逆交，序其詩，稱以將相之才，詞詭譎而心叵測」⁷⁹，指的就是劉正宗為張縉彥《燕箋詩集》撰序及其中所稱：

先生胸富二酉，裕經術，砥躬飭行，儀表群品。茲且出其生平未殫之蘊，維持世運，當不難易晚近而綦隆。然則揀弊扶衰，豈惟詩哉！豈惟詩哉！⁸⁰

一般研究著作多集中張縉彥遣戍寧古塔後的介紹，亦即其與吳兆騫等七子於邊地的文學、文化活動。筆者目前所收諸作幾乎成於流放之前，不僅可理解張縉彥於清初之際遇、感懷，與之相關的研究不足或可因此補充。例如從張縉彥順治 11 年（1654）任浙江布政使的書寫考察，或可再深探被學者認定已亡佚的《無聲戲》二集版本、流傳等問題，以及作者李漁、評點者杜濬與刊刻者張縉彥的交往互動。

綜觀函可、左懋泰仍待深究的出處作為，張縉彥曲折複雜的委蛇應對，說明了或礙於文獻散失不全，或各有迥異的生存處境，易代的認同詮解實屬不易。特別在明清之際，北人與南人的不能一概論之，⁸¹氏族家庭對於出處安排的多方考量，⁸²以及個人在明亡前後的仕途際遇，都成為影響進退的關鍵因素。回到清初流放東北文士，桐城方氏不乏如方以智，方文亡明後絕意仕途，但方拱乾一家顯然做了另一種抉擇。至於季開生，父親季寓庸與魏忠賢等閹黨交好，崇禎 2 年（1629）定「逆案」，革職歸泰興經營鹽務。其弟季振宜（1630-?）入清官至廣西道御史，是清初著名的藏書家，「靜思堂」和「辛夷館」，藏書之富，冠於江南。錢謙益曾孫錢曾死後，書盡歸振宜，後撰成《季滄葦藏書目》，成為康熙時編《全唐詩》的底本。其姐季嫻（1614-1683），

⁷⁹ 〈貳臣傳乙〉，同註⁶⁰，卷 79，頁 6624。

⁸⁰ 《燕箋詩集》，上海圖書館藏順治 11 年刻本。

⁸¹ 詳參《華北仕清漢官與明遺民的出處》，同註⁶⁸。

⁸² 黃毓棟：〈明遺民家庭對出處的安排——寧都魏氏個案研究〉，《漢學研究》，第 22 期 2 卷，2004 年 12 月，頁 387-419。

不但是清初著名的才女，編選《閨秀集》、《詩餘》，提供後來王端淑（1621-1706）選編《名媛詩歸》的依據。⁸³泰興方氏一族，面對甲申鼎革有何自處之道，目前之論述仍然不足。至若因北闈科場案遣戍的孫暘與赤崙和尚並非同一人，張玉興已作了初步考證，⁸⁴當可在其基礎上再深究其生平、書寫。種種現象催促著文獻尋訪與再細密考察的必要性，故為筆者近年來一再自我警策之所在。

四、民族意識下的「流放」論述

回顧近當代學者對於東北流放文士的關注，四〇年代謝國楨（1901-1982）專題史之研究舉足輕重，⁸⁵奠定後來如大陸學者李興盛、何宗美，乃至一般東北文學、文化史的論述基礎。⁸⁶亦即從造成清初士大夫流徙等政治事件，如順治 14 年科場獄案、史獄、文字獄、通海案、朋黨案，⁸⁷推出：

與東北流人史有關的較大規模的文字獄主要有兩次。……共同特點，即案件大多是由於作品有反清復明的民族意識而引起的，具有民族鬥爭色彩，這正是該時期時代特點的反映。⁸⁸

東北流人現象總體的原因主要也在於……一是與清初此起彼伏的反清浪潮密切

⁸³ 季振宜生平參朱宗宙：〈清初揚州著名藏書家——季振宜〉，《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 卷第 4 期，2003 年 7 月。《閨秀詞鈔》：「季嫺，字靜缺，號元衣，泰興人。吏部季寓庸女，李長昂室，有《雨泉龕詩》。」徐乃昌輯：《小檀樂室彙刻百家閨秀詞》，清宣統元年（1909）小檀樂室刻本，卷 3，頁 14b。

⁸⁴ 張玉興：〈孫赤崖與赤崙和尚考〉，《明清史探索》（瀋陽：遼海，2004 年），頁 362-371。

⁸⁵ 《明末清初的學風》，同註⁶，頁 97-170。

⁸⁶ 文學史、文化史通論對於清初流放文士的敘述，如彭放：《黑龍江文學通史》（哈爾濱：北方文藝，2004 年）、佟冬主編：《中國東北史》，同註¹⁸，頁 1685-1781。《東北通史》，同註²³，頁 541-548。

⁸⁷ 《明末清初的學風》，同註⁶，頁 103-104。

⁸⁸ 《中國流人史》，同註⁴⁰，頁 663、664。

相關，二是清統治者對漢族縉紳士人及其反清勢力殘酷鎮壓所致。⁸⁹

李興盛、何宗美的論斷顯然延續謝國楨「從清順治初年到乾隆初年，凡觸犯清廷的忌憚，有思想不良嫌疑的人們，都謫戍到東北去。」⁹⁰大批文士流放東北，不能等同於古代官吏降職或流放的貶謫事件，應與清初嚴峻的政治氣氛因果相依，也就是藉此排除異己，打壓不願屈服的漢族文士。然在此前提下，極易模糊或一概而論流放文士的進退抉擇。經過前文闡釋，明亡後持續抗清，唯有通海案楊越、祁班孫、李兼汝等人。不論之前是否曾降於李自成，李呈祥上書主張部院各衙門「應裁去滿官，專用漢人」⁹¹，季開生犯顏極諫順治帝派內監往江南點選秀女之事，⁹²魏琯要求修改「逃人法」，⁹³都直指統治者弊病，在易代之際選擇投向新朝的作為不容置喙。在清人眼裡，異議諍言的確具有思想不良嫌疑。就士人立場，何嘗不是知識份子直諫無畏的一貫風骨，反顯出對於新朝的盡責，不能一概歸於抗抵的民族意識。如親自料理函可身後事的郝浴，彈劾吳三桂驕橫不法及其部下虐民事反被誣劾流徙塞外 20 餘年，由其身為北人，並在戰亂之際避禍山間，順治 3 年隨即參加鄉試的際遇看來，應該也沒什麼抗清意圖。⁹⁴至於同樣流放瀋陽的左懋泰，姑不論其果真代朝廷勸說左懋第，降於李自成不假，

⁸⁹ 《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同註⁴，頁 354。

⁹⁰ 《明末清初的學風》，同註⁶，頁 98。

⁹¹ 《清史稿》，卷 244〈李呈祥傳〉：「十年二月，條陳部院衙門應裁去滿官，專用漢人。上諭大學士洪承疇等曰：『呈祥此奏甚不當。昔滿臣贊理庶政，弼成大業。彼時豈曾咨爾漢臣？朕滿、漢一體眷遇，奈何反生異意耶？』副都御史宜巴漢等因劾呈祥，奪官，下刑部，坐呈祥巧言亂政，論斬，上命免死，流徙盛京。」《清史稿》，同註¹¹，頁 1037。

⁹² 《清史稿》，卷 244〈季開生傳〉：「遣內監往江南採購陳設器皿，民間訛言往揚州買女子，開生上疏極諫……因責開生肆誣沽直，下刑部杖贖流尚陽堡，尋卒戍所。」《清史稿》，同註¹¹，頁 1037。

⁹³ 《清史稿》，卷 244〈魏琯傳〉：「又言：『逃人日多，以投充者眾。本主私縱成習，聽其他往，日久不還，概訟為逃人。逃人至再，罪止鞭百，而窩逃猶論斬，籍人口、財產給本主。與叛逆無異，非法之平。』……，下王大臣議琯巧寬逃禁，當坐絞，上寬之，降授通政司參議。德州諸生呂煌窩逃事發，州官當坐罪，琯持異議。王大臣劾琯，因追議琯前請熱審減等為煌地，坐奪官，流徙遼陽，卒於戍所。」《清史稿》，同註¹¹，頁 1037。

⁹⁴ 趙玉敬：〈盛清名臣郝浴年譜簡編〉，《河北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 3 期，2003 年 9 月，頁 39-40。

舉家百口被流放鐵嶺亦為事實。「不僅未曾降清，且顯然有對抗之嫌」⁹⁵、「能保持『大雪自應持漢節，高松寧肯受秦封』的民族氣節」，⁹⁶在相關文獻有限的現況下，顯然又過於武斷判定。

敘述清初東北流放文士何以如此著重，或者說強調其頑強的抗爭精神，必須理解開拓者謝國楨對東北史研究的重視乃基於「滿腔救亡圖存的愛國熱忱與民族意識，……對日俄統治者特別是日本學者格外『重視』對中國邊疆史的研究感到觸目驚心。」⁹⁷謝國楨在《清初東北流人考》引論特別追憶「九一八」東北淪陷前，「從瀋陽坐火車到長春或者到哈爾濱」所見之豐饒國土，引之對照的正是《吉林通志》記載楊越所處「人迹罕到」、「異鳥怪獸，叢哭林噪」的荒徼邊地。⁹⁸因通海案與祁班孫、李兼汝流放寧古塔的楊越，堅定反清立場在當時流放東北的文士群體中實屬少數，熟稔史冊文獻的謝國楨卻獨獨憶起，強烈的民族情懷溢於言表。「無名英雄的不朽精神和吾國民族的光榮，將永遠流傳在吾國光耀的東北」，⁹⁹既是不朽精神，又為民族光榮，如何解釋某些流放文士曾在覆巢時刻倒戈歸順。或是近現代學者大都數語交待文士流放之前生存實況的主因之一。甚至面對某些資料有限，仍可爭議的歷史懸案，寧可選取貼合的臆測。函可以宗教活動為掩護，密謀抗清，私撰充溢濃厚愛國情感的史著而慘遭文字獄，「暴露了清統治文化專制主義和民族高壓政策的殘酷性」。¹⁰⁰左懋泰最好也是投身反清行列，並非勸解從兄降清的有志之士。

不只東北史，謝國楨對南明史、明清之際的貢獻也是有目同睹，《南明史略》、《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在在說明其對此段歷史的專注與在意。此外，抗戰時期，面對日本學者對於東北稱謂、民族關係、疆域沿革、東北與朝鮮、日本關係的研究風潮，諸如傅斯年（1896-1950）、金毓黻（1887-1962）、馮家昇（1904-1970）等史學家，

⁹⁵ 張玉興：《清代東北流人詩選注》（瀋陽：遼瀋書社，1988年），頁60。

⁹⁶ 《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同註⁴，頁382。

⁹⁷ 柳成棟：〈謝國楨與黑龍江〉，《黑龍江史志》，2005年，頁39。

⁹⁸ 《明末清初的學風》，同註⁶，頁97。

⁹⁹ 《明末清初的學風》，同註⁶，頁104。

¹⁰⁰ 《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同註⁴，頁374。

擔憂日本學者假學術之名，行政治侵略之實，造成積非成是的歷史曲解，無不懷著強烈的民族精神，紛紛於「九一八事變」後投注中國東北史研究，傅斯年《東北史綱（初稿）》、金毓黻《東北通史》皆為此期的重要著作。¹⁰¹因此列入〈貳臣傳〉的陳之遴、張縉彥，《清初東北流人考》支字未提，任清官職如李呈祥、季開生、郝浴、魏琯等人視同貳臣。¹⁰²此區判某種程度說明長久以來對於明清之際士人出處的評價，仍舊處於明遺民與清貳臣的二元準則。以致謝國楨與後來相關論著大都面臨遣戍東北後文士不分身分融洽相待的尷尬說明：

是時函昱開山雷峰，而函可也廣揚釋教於瀋陽，與函昱雖嶺海遠隔而聲氣相通。……函昱在嶺南所收門徒多為明季忠烈之士，而函可在瀋陽所結交的多為清初譴謫諸臣，亦因時地不同，故所交往之人亦因之而異。¹⁰³

當時瀋陽、開原和鐵嶺等地是文化流人比較集中的地方。……這些人的罪名不一，思想傾向也並不完全相同，其中除了左懋泰、函可等少數人以明朝遺民自居外，大部分為明朝貳臣。但是，同樣的流放遭遇，從不同角度出發對清治的不滿，使他們有了一定共同語言，建立了密切的聯繫。¹⁰⁴

不獨與李呈祥、魏琯等冰天詩社成員，陳之遴〈悼剩公〉、〈送剩公入塔〉，¹⁰⁵說明

¹⁰¹ 詳參王夏剛：〈論抗戰時期的中國東北史研究〉，《大連大學學報》，第26卷第5期，2005年10月，頁91-95。榮文庫：〈試評金毓黻的東北地方史研究〉，《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期，1994年，頁49-54。

¹⁰² 「其餘諸人（李呈祥、魏琯、郝浴、季開生、李龍袞、陳心簡等）均為貳臣，見於《清史稿》和《盛京通志》」、「既至天下稍定，他（順治帝）慢慢地信不過這一般投降的貳臣了，先從言官來開刀，於是李呈祥、季開生、魏琯等，首當其衝，謫戍到塞北。」《明末清初的學風》，同註6，頁107、158。

¹⁰³ 《明末清初的學風》，同註6，頁107。

¹⁰⁴ 《中國東北史》，同註13，頁1700。

¹⁰⁵ 〈悼剩公〉：「朔雪蕭蕭祇樹林，紫衣長掩石龕深。公真聖果身如寄，我自凡情涕不禁。電火難留方外友，風霜偏集客中心。千山尚有蓮花座，夜夜松濤想法音。」〈送剩公入塔〉：「幾年踪跡歎飄蓬，短髯蕭蕭紫塞東。又向朔風揮老淚，一天冰雪送支公。」陳之遴：《浮雲集》，卷8，頁3-4、

二人多有往來，情誼不淺。陳之遴亦與流放寧古塔之方拱乾、吳兆騫交情深厚，起因於幾人同時因案入獄，三人各留下了不少彼此追懷、贈答之作。¹⁰⁶同樣被列入〈貳臣傳〉的張縉彥，於康熙4年（1665）夏在寧古塔倡儀七子之會，與吳兆騫、姚琢之、錢威、錢虞仲、錢方叔、錢丹季等人密切往還。以上情形說明了遺民、貳臣之截然劃分無法展現明清之際複雜、周折的自我定位，更不能釐清千絲萬縷的士人網絡。因此力倡清初流放東北士子多是對清治不滿的骨鯁志士，也不能不承認「因時地不同，故所交往之人亦因之而異」，且「這些逐臣和函可是魚網同罹，家鄉萬里，塞北荒磧，同為謫客的命運使他們結合到一起來了。」¹⁰⁷

基於此，闡釋此段歷史實該跳脫晚清以降，乃至抗戰時期民族意識之大纛，正視個別主體，氏族群體的存在實況。換言之，不管晚清革命派為建立單一民族國家，重新塑造漢族國史，以「排滿」作為漢族民族意識覺醒之手段，而對「南明」歷史諸多人事進行文獻和詮說的重建。¹⁰⁸還是抗戰時期如謝國楨力主「清初流人與當地少數民

卷11，頁6。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197》（臺北：莊嚴，1997年），頁644-645、665。

¹⁰⁶ 如陳之遴：〈寄懷吳子漢槎四首〉、〈答吳子漢槎〉。《浮雲集》，卷6，頁10-11。卷8，頁3，《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197》，頁628-629、644。方拱乾：〈吳漢槎見過〉、〈寄懷陳素庵〉、〈漢槎以黃山詩來憚夜歸〉、〈壽吳漢槎〉等，方拱乾著、李興盛等整理：《方拱乾詩集（何陋居集（己亥年））》（哈爾濱：黑龍江教育，1992年），頁34、57、64、73。吳兆騫：〈奉寄陳相國素庵先生〉、〈冬夜同諸子飲方坦庵先生齋即席賦呈〉、〈戊戌除夕偕諸子集陳素庵先生齋即席同直方子長賦〉、吳兆騫著、麻守中校點：《秋笳集》（上海：上海古籍，1993年），頁96、144、145。

¹⁰⁷ 薛虹：〈函可和冰天詩社〉，《史學集刊》，第1期，1984年。

¹⁰⁸ 明清之際、清初東北流放文士，乃至晚明的詮解建構，以晚清、抗戰時期為二高峰，其中所牽涉的複雜面向值得再細究。事實上，謝國楨同時著有《南明史略》（上海：人民，1957年），《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1981年）、《清初史料四種》（臺北：進學，1970年）、《清開國史料考》（臺北：藝文，1968年），對晚明清初所下史料考證工夫更是有目共睹。學界對此議題亦見論述，夏曉虹：〈歷史記憶的建構——晚清「男降女不降」釋義〉，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2004年），頁114-141。王春霞，〈排滿與「民族主義」〉（北京，社會科學，2005年）、林香伶：〈時代感懷與國族認同——柳亞子「南明書寫」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5期，2006年5月，頁105-138。林香伶：〈鄉邦意識與族群復興——陳去病「南明書

族進行了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民族的融合與團結。」^⑩、「對促進我國東北地區的社會發展和加強滿漢民族融合作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⑪、「遂建立了漢族和滿族人民在東北共同協作的基礎。」^⑫都為了強化東北與內地在人種上、文化上的關聯性，證明廣大東北乃中國領土，絕不容日本覬覦。這種以漢族為主的研究視角，西方學界已進行熱烈爭論。1996年4月4日第8屆亞洲研究學會年會於夏威夷舉行，美國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教授Evelyn S. Rawski發表了〈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一文（其後發表在《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4期，1996.10）。Rawski認為清朝能夠成功維持300年統治，主要原因並非漢化，在於有效利用如蒙古等內陸亞洲非漢民族的文化聯繫，也就是多民族的帝國統治，遂強調以「滿族中心論」來重新詮釋清帝國。曾有專文論述清朝統治者「漢化」問題的何炳棣，為此特別撰寫〈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一文，反駁Rawski觀點。但美國漢學界對Rawski的說法反響熱烈，除Rawski後來出版《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一書持續闡釋自己看法，探討滿族族群與其主體意識的研究論著亦逐一見世，其中Pamela Kyle Crossley探討了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演變與身份塑造、Mark C. Elliott則從八旗的社會結構、旗人的生活方式與八旗制度等深究滿族族群認同的形成。^⑬

事實上，「滿洲」一詞遲至明崇禎10年，天聰9年（1635）皇太極下詔統一「往

寫」研究，《東華人文學報》，第10期，2007年1月，頁181-232。

- ⑩ 李興盛：〈清初流人及其對黑龍江地區的開發貢獻〉，《中國流人史與流人文化論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2000年），頁191。
- ⑪ 《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同註④，頁353。
- ⑫ 此說同樣延續謝國楨的觀點，「滿族人見他們彬彬有禮，知識學問很高，也不敢像以往對待流人一樣，虐待輕視，而且物質上、精神上都得到他們協助的利益，遂立定了漢族和滿族人民在東北共同協作的基礎。」《明末清初的學風》，同註⑥，頁160。
- ⑬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Pamela Kyle Crossle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ark C. Elliot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往稱諸申（女真）」的各部落稱呼方才出現。^⑬所謂滿洲族群之集體記憶與源流系譜歷經了大規模的想像動員。明證之一是流放文士甚多的瀋陽，天聰 8 年（1634）皇太極下令將官名及城邑名改以滿語，從此「『瀋陽』改稱Mukeden（漢音穆克敦），漢文譯為『天眷盛京』，意即清王朝起家立業的龍興重地；盛京城名為「MukedenHoton」。

⑭ 依丁海斌、時義的看法：

首先，將都城改名盛京，顯示其在政治上的獨立性。……其次，將都城稱Mukeden，顯示其文化上的民族獨立性。以前的域名、官名是用漢語，此次的改稱，是將漢語名改成本民族的滿語名稱，以體現其獨立性。^⑮

崇德元年（1636），皇太極受尊號「寬溫仁聖皇帝」，建國號為「大清」，從此，瀋陽成為清王朝的發源地，政治經濟地位極為崇高。入鼎中原，遷都燕京後，順治 2 年（1645）廢明陪都南京，明訂盛京為陪都，作為皇帝回東北祭祀新賓永陵和瀋陽福陵、昭陵三座祖陵期間瞻仰、駐蹕之所。且又因其地扼東北要衝，乃兵家必爭之處，戰略位置極其重要，在此駐紮的軍隊，規格和數量遠超過北京以外的其他地區，並設有盛京將軍衙門、盛京兵部。其實皇太極不僅將「『瀋陽』改稱Mukeden（漢音穆克敦），「還將以前沿用明朝的漢官名如總兵官、副將、參將、游擊、備御等分別改稱漢語名昂邦章京、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錄章京等。」^⑯，並且創制和改進滿文。^⑰前文所介紹「柳邊條」之構築，亦是清人有意識保護龍興之地，與其他族群的隔離封線、

⑬ 皇太極詔諭曰：「我國原有滿洲、哈達、葉赫、輝發等名，向者無知之人，往往稱為諸申。夫諸申之號，乃席北超墨爾根之裔，實與我國無涉。我國建號滿洲，統緒綿遠，相傳奕世。自今以後，一切人等，止稱我國滿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稱」。《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臺北：新文豐，1978 年），卷 25。

⑭ 《清代陪都盛京研究》，同註③，頁 10。

⑮ 同註③，頁 11。

⑯ 《清代陪都盛京研究》，同註③，頁 11。

⑰ 創制滿文與改定族名為滿洲，乃滿族由初步建構成到最後成型的兩個重大標誌，文字創制工程在努爾哈赤手中完成。萬曆 27 年（1599），巴克什額爾德尼、扎爾固齊噶蓋被任命創制並編成國語頒行之。詳見《大清太祖皇帝實錄》（臺北：新文豐，1978 年），卷 3，頁 25-33。

目的在於防止滿族漢化，獨占東北特產。事實上，清廷深懼祖宗發源地受到漢族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高度影響，漸失滿族本習。清初為恢復飽受戰爭摧殘的東北繁榮，頒令〈遼東召民開墾令〉，造成大量漢人涌入後，又頒布阻止漢族人民出關的封禁政策。¹¹⁶雖然封禁成效不彰，有意識維護族群主體的意識頗為明顯，以「滿族漢化」的研究論述確實可作調整，兼以其他的觀察視角。

五、餘 論

在清史、滿族史愈來愈受重視的情況下，明亡前與清長達數十年的糾葛益發受到關注，其論述區域自然擴及清朝的龍興之地，廣大的遼東一帶。明清之際流放東北文士的生命史橫越二朝，大都經明亡清興時期，其流放地，又一律為滿洲人聚居的東北地區，無論時間或空間都觸及了學界目前甚為關心的範疇，此乃筆者近年來進行系列研究的原因之一。除了漢族思維之外，提供另一種觀看視角，¹¹⁷同時跳脫忠於亡明、

¹¹⁶ 清廷對於東北的封禁政策及其弊病，詳見刁書仁：〈論乾隆朝清廷對東北的封禁政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6期，2002年11月，頁83-90。劉智文：〈清代封禁政策當議〉，《學習與探索》，第6期，2003年。賈文華：〈清代封禁東北政策研究綜述〉，《綏化學院學報》，第26卷，第6期，2006年12月，頁124-126。

¹¹⁷ 此種不再從漢族立場的「滿族中心論」，與學界關於中國現代性的熱切討論關聯甚大。大陸學者如汪暉、陳平原、陳曉明等人認為文明、處境大不相同的中國，自有歷史發展脈絡，提出從「西方中心」移轉到「中國中心」的觀察視角。日本學者亦持相同見解，其中最著名的是溝口雄三主張中國的近代從開始就走了一條與歐洲和日本都不相同的獨特道路，以太平天國（1851-1864）前後為分界線，將上溯至王陽明近350年的歷史，界定為「前近代」，之後則為中國之「近代」，建立了一條自王陽明、李贄、戴震、譚嗣同到孫中山，重新梳理近代中國思想的譜系。溝口此說影響頗大，也仍有可商榷處，但從中國自身的角度來闡釋中國問題確實是洞見。於是「中國」的概念內涵也形成一波熱烈討論，加上民族國家的議題研究方興未艾，循著中國民族主義的溯源追探，很自然地以異族之姿定鼎中原的大清王朝備受矚目，進而逼生了如Rawski的觀察。詳見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2004年）、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臺北：麥田，2000年）、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1999年）。溝口雄三著、索介然、龔穎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北京：中華，1997年）。溝口雄三學說之介紹及其省思，詳見葛兆光：〈評90年代日本中國學的新觀念——讀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

背叛漢族的道德二元判斷。誠然，歷史所見，所評大多依其具體作為，函可親撰《再變記》，篋笥藏有〈弘光帝答阮大鍼書稿〉是事實，由是慘遭酷刑而被流放塞外之生平極易被視為抗清典範。而任憑如何詮說自剖，張縉彥就是降清貳臣，遂而飽受迎降及左右搖擺的歷史輿論。左懋泰介於二者之間，或褒或貶的雜音皆有，可惜的是目前尚缺乏自我發聲的力證。然易代之際出處進退的複雜即在此，一時的抉擇並不代表之後長遠的認同，實際的作為或無法全然呈現內心之掙扎。前者如曾經堅定復明的抗清遺民，隨著時序轉移，逐漸出現不同程度的鬆動思維。後者像張縉彥之類的貳臣，心底深處似乎也有著亡國逋臣，忠貞補天的自我期許與悲慨。重新爬梳、檢討並不是要扭轉歷史，而是一方面理解既有的言說為什麼以及如何被建構，如同本文所考察「流放」論述與民族意識的緊密關聯；一方面跳脫框架，了解其他詮釋觀點的論述用心，從而明白諸如張縉彥、左懋泰等主體在面對認同抉擇時複雜而糾葛的心理擺盪。這種給予各種身分、不同族群眾聲喧嘩的多方體察，何嘗不適用於當代個人與群體的省思檢視！

《二十一世紀》，總第9期，2002年12月。楊芳燕：〈明清之際思想轉向的近代省察——研究現狀與方法的省察〉，《漢學研究通訊》，20卷2期，2001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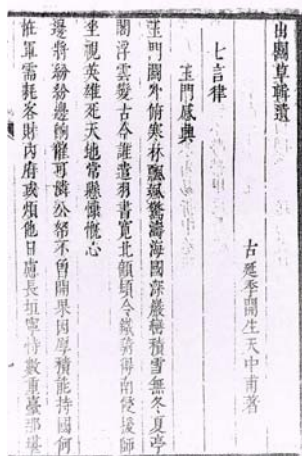
附錄 清初流放東北文士書影



張縉彥《歸懷詩集》
上海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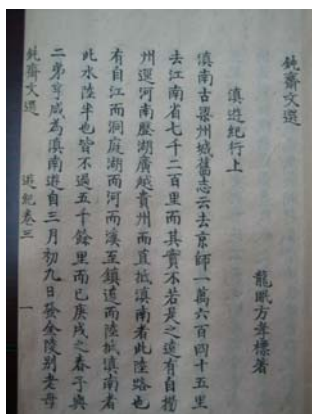
張縉彥《徵音詩集》，上海圖書館藏



季開生《出關草輯遺》
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張賁《白雲集》，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方孝標《鈍齋文選》，上海圖書館藏



丁澎《扶荔堂詩集》，上海圖書館藏

主要參考及引用文獻

一、古代典籍

梁秉錕等修、王丕煦纂：《萊陽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本，臺北：成文書局，1968年。

趙興德修、王鶴齡纂：《義縣志》，見《中國方志叢書》本，臺北：成文書局，1973年。

《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8年。

清·趙爾巽等：《清史稿》，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1年。

清·張縉彥撰：《域外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清·方拱乾撰，李興盛，張杰點校：《絕域紀略》，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清·賈弘文修、李廷榮補輯：《鐵嶺縣志》，見《遼海叢書》本，瀋陽：遼瀋書社，1985年。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清·張縉彥撰、王興亞點校：《菴居封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

清·阿桂等纂修：《欽定盛京通志》，見《欽定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清·吳兆騫撰，麻守中校點：《秋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清·函可：《千山詩集》，見《續修四庫全書》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刻本影印（冊139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清·陳之遴：《浮雲集》，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旋吉堂刻本影印（冊197），臺北：莊嚴出版社，1997年。
- 清·談遷著、張宗祥點校：《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清·鄭廉：《豫變紀略》，見欒星輯校：《甲申史籍三種校本》，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楊賓撰：《柳邊紀略》，見《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冊7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清·朱浴：《忠義錄》，見高洪鈞編：《明清遺書五種》，北京：北京圖書館，2006年。
- 清·郝浴：《中山全集》四種15卷，臺灣傅斯年圖書館藏，據康熙間旋吉堂本翻印，清康熙間（1662-1722）刊本。
- 清·吳邦策：《國變錄》，見《秘冊叢說14》，傅斯年圖書館藏鈔本。
- 清·張縉彥：《燕箋詩集》，上海圖書館藏順治11年刻本。
- 清·徐乃昌輯：《小檀樂室彙刻百家閨秀詞》，清宣統元年（1909）小檀樂室刻本。

二、現代中西論著專書

- 謝國楨：《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 謝國楨：《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局，1968年。
- 謝國楨：《清開國史料考》，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
- 謝國楨：《清初史料四種》，臺北：進學書局，1970年。
- 《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汪宗衍：《明末剩人和尚年譜》，見《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20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張玉興選注：《清代東北流人詩選注》，瀋陽：瀋陽書社，1988年。
- 羅彤：《漢代的流民問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

- 李興盛：《東北流人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 馬福清：《東北文學史》，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2年。
- 李興盛主編：《中國流人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 陶德陽：《流民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
- 溝口雄三著：《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索介然、龔穎譯，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 佟冬主編、叢佩遠著：《中國東北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
- 魏斐德著：《洪業——清朝開國史》，陳蘇鎮、薄小瑩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 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李興盛：《中國流人史與流人文化論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 池子華：《流民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0年。
- 李興盛主編：《詩人吳兆騫系列（1~3）》，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 李興盛主編：《流寓文化中黑龍江山水名勝與軼聞遺事》，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
- 彭放主編，韓明安等著：《黑龍江文學通史》，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02年。
-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
- 張玉興：《明清史探索》，瀋陽：遼海出版社，2004年。
- 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上海書店，2004年。
-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局，2004年。
-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 王春霞：《排滿與「民族主義」》，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 楊海英：《洪承疇與明清易代之際》，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 司徒琳：《南明史》，上海：上海書店，2007年。

丁海斌、時義：《清朝陪都盛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三、單篇論文

薛虹：〈函可和冰天詩社〉，《史學集刊》第 1 期，1984 年。

榮文庫：〈試評金毓黻的東北地方史研究〉，《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期，1994 年。

朱宙宙：〈清初揚州著名藏書家——季振宜〉，《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 卷 4 期，2000 年。

楊芳燕：〈明清之際思想轉向的近代省察——研究現狀與方法的省察〉，《漢學研究通訊》20 卷 2 期，2001 年。

刁書仁：〈論乾隆朝清廷對東北的封禁政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6 期，2002 年。

葛兆光：〈評 90 年代日本中國學的新觀念——讀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二十一世紀》總第 9 期，2002 年。

劉智文：〈清代封禁政策當議〉，《學習與探索》第 6 期，2003 年。

趙玉敬：〈盛清名臣郝浴年譜簡編〉，《河北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 3 期，2003 年。

黃毓棟：〈明遺民家庭對出處的安排——寧都魏氏個案研究〉，《漢學研究》第 22 期 2 卷，2004 年。

王夏剛：〈論抗戰時期的中國東北史研究〉，《大連大學學報》第 26 卷 5 期，2005 年。

柳成棟：〈謝國楨與黑龍江〉，《黑龍江史志》，2005 年。

王學玲：〈是地即成土：清初流放東北文士之「絕域」紀游〉，《漢學研究》，第 24 卷 2 期，2006 年。

賈文華：〈清代封禁東北政策研究綜述〉，《綏化學院學報》第 26 卷 6 期，2006 年。

林香伶：〈時代感懷與國族認同——柳亞子「南明書寫」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 5 期，2006 年。

林香伶：〈鄉邦意識與族群復興——陳去病「南明書寫」研究〉，《東華人文學報》第 10 期，2007 年。

王學玲：〈一個流放地的考察——論清初東北寧古塔的史地建構〉，《文與哲》第 11 期，2007 年。

四、學位論文

黃色芬：《華北仕清漢官與明遺民的出處》，臺北：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97 年。

王學玲：《明清之際辭賦書寫中的身分認同》，臺北：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

From Dynasty Change Experience to Re-examine the Origin Identification of the Literati Banished to the Northeast in Early Qing

Wang, Hsueh-l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 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umber of the literati banished to the barren Northeast in Early Qing is beyond imagination. Yet, scholars have not paid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 Even if discussed, the attention has only paid to their lives in exile. In fact, these banished literati include those from both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drastic state and family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traumatic dynasty change should be also important elements of their lives as well. The development in the year of 甲申 (1644) not only demonstrated the difficult situations of the individuals under the trouble times but also revealed the complicated political as well as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problem at the time. Integrating the dynasty change experience into the analysis and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terati,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ir banishment and explicates the sophisticated mental entanglements of their identification searches based on origin under the change of dynasties. First,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restore certain historical reality and list the consolidating origin choices of banished literati. It describes the banished construction, cases, and experiences with death in their banishment or back to center land. Secondly, by using some unexplored yet or particular case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mplicated appearance of origin choices in banished literati. Finally, through analyzing the reasons of their banishment,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conclusions from contemporary scholars' discussions of the banished literati in the Northeast, among which their treatments on the origin choices of the literati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ir evaluations of those Ming literati who surrendered to the Qing particularly need further re-thinking.

Keywords: 甲申, Exile or Banishment, Early Qing, Northeast, Identification

